

经济学家扮演什么角色

（一）谁能竞争诺贝尔奖

经济学是显学，经济学家引人注目当然是正常的现象。中央电视台评选年度经济人物的时候，专门为经济学家预留一个位置，从中也反映了社会公众对经济学家的重视和肯定。

那么什么样的人堪称经济学家呢？是不是只有科班出身的人才能成为经济学家呢？

答案是否定的。比如 2003 年度央视的经济人物当选的学者是温铁军，而温铁军当初并不是学经济而是学新闻的，但是在工作实践中，温铁军把中国的三农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长期用脚在基层搞调查，积极推进了农村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从而赢得了包括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在内的评委们一致的尊敬。再比如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的薛暮桥，薛暮桥只有初中文化，他的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学来的，

一方面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薛暮桥的标志性作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发行了 1000 万册，曾经被中宣部定为中共干部必读书，薛暮桥的写作素材全部来自山东、江苏、安徽的基层调查，所以他的作品才有生命力。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以经济学家的名分在北京工作的学者少说也有 3000 多人。有人把这些学者分门别类概括出几种人群。一类经济学家堪称政策经济学家，中共中央国务院有什么新政策新文件新精神，他们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解释，惟独没有自己的观点；一类经济学家堪称决策经济学家，他们身在民间或者所谓的事业单位，但是眼睛却盯住决策部门的一举一动，或择机进言，影响决策，或察颜观色，引导媒体，他们的成就就体现在决策的影响力上；一类经济学家堪称古典经济学家，也可以称为理论经济学家，他们坚守学术研究的领地，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发表相对独立的见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类经济学家堪称政府经济学家，他们供职在政府机构，处在决策层和管理层之间，负责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确切地讲他们只是技术官僚，并不拥有个人学术观点；一类经济学家堪称老板经济学家，他们或有自己的公司，或在商业机构任职，他们的所思所想与其说是一个学者的思维不如说是一个商人的逻辑，他们的功利色彩事实上已经把学术的客观冲得乱七八糟。

不同类别的经济学家，尽管各自的定位不同，影响力不同，但是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经世致用。围绕着中国股市，就有这么一批经济学家，又称股市经济学家。他们时而聚合，时而论争，成为中国股市独有的风景。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股市的几起几伏，表面上看是政策的起伏，实际上是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的起伏，与其说是决策层没有主见，不如说是经济学家

的影响力此消彼长。“5·19”行情前后经济学家们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说明，2001年围绕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讨论也是最好的说明。

中国股市对于中国经济学家的吸引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在水皮印象中几乎所有顶级或次顶级的经济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这个是非场，厉以宁号称厉股份，萧灼基号称肖股评，吴敬琏号称吴市场，这些且不去说，就是像董辅弼、黄达、戴园晨这样的大师也不能免俗，甚至像林毅夫这样最具实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寂寞英雄也心猿意马。

这是为什么？

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股市是一个存在着严重制度缺陷的市场，作为缺陷经济学的活教材，中国股市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全球惟一性的标本意义。崇尚“推倒重来”的海归派之所以受到普遍的奚落，在于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成为经济学家的基本素质，具备从一般中发现特殊的素质，照猫画虎是简单的模仿，是学生的所为，根本用不着上美国上英国上日本去学习，幼儿园的绘画班就可以解决。中国股市是一个特殊的股市，股权分置是表面现象，表面上看成熟的股市都是全流通的股市，而中国却存在着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问题，股权分置成为中国股市和海外股市的“差异”。而实际上，中外股市的最大差异在于生成的社会制度有着巨大的不同。国外股市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基础上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私有经济寻找资本社会化的产物，而中国呢？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股份制是实现公有制的一种新途径。社会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决定中外股市存在的形态必然不同，这就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屠光绍所言不能用解决差距的办法解决（中外股市）差异的正确含义。

谁能在中国股市这么一个特殊的形态中实现一般股市的本质回归，同时还要避免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回避金融危机，谁就是新世纪的中华民族的经济英雄，谁就最有资格竞争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成思危何以有权威

在中国的股市经济学家中，成思危先生是一个另类。成思危既不是政策经济学家，又不是决策经济学家，更不是政府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权威经济学家”。

成思危何以独树一帜成为“权威”的代言人呢？这和成思危的地位和做事有着极大的关系。

成思危先生既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在一般人的概念中，人大常委会并没有什么行政的权力，但是却拥有立法的权力，围绕中国证券市场的相关立法，成委员长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没有成思危的谅解，任何来自证监会的行政努力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举例来说，深圳开设创业板费尽了周折直到最近才由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在深圳表态“社会各界对通过建设中小企业板，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已达成共识”，建议中小企业板择机尽快出台。众所周知，创业板的前世是高新科技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与高新科技板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概念。从法律上讲，中小企业板不存在什么障碍，不需人大常委会单独立法，而高新科技板则不同，必

须由人大常委会修改《公司法》以扫清三年盈利的硬杠杆。“支持有条件的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进入证券市场融资，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高新技术的股份有限公司运用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要坚持国家产业政策，符合高新技术要求，根据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特点，其上市交易的股票在现有的证券交易所内交易系统进行交易，鉴于此项工作缺乏经验，加之风险较大，应当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进行”，这是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高新技术板的概念最早是由科技部提出来的，在实施过程中“双高”的资格认定以及管辖发生争持造成事实上的不了了之，高新技术板由此被演绎成了创业板，创业板当然是没有高新技术板《公司法》豁免特权的承继资格的，也就是说在深圳设立创业板于法无据，设想，仅仅是设想。没有成思危点头，创业板就没门。这是“权威”两字中“权”的出处。

按常理讲，成思危先生为创业板别说点头，就是摇旗呐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为什么？因为成思危号称“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在过去的几年中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1998年还是他在全中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的“一号提案”，风险投资才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但是，偏偏就是这个“风险投资之父”在创业板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谨慎。理由就是在中国股市过度投机的氛围之下，二板的推出会加重过度投机，监管也更加困难，难以确保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他更赞成的是在主板市场中设科技板块而不是单独设市，因为成思危知道在目前排队等待上创业板淘金的上千家公司中，70%是在1999年听到创业板的风声之后才成立的，绝大多数公司来路不正。针对相当一批经济学家的呼吁，成思危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据国外情况，风险投资通过二板市场上市比率仅为30%，另70%通过兼并收购上市，

因此，二板市场并不是融资的惟一出路。一个“风险投资之父”在创业板的诞生上却成了“肠梗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在水皮看来，正是这个奇迹造就了成先生“权威”两字中的“威”。这个“威”不是以势压人的威风，而是一种摆脱了个人“低级趣味”的威信，超脱了学者文人的迂腐和童真，超脱了商人和政客의贪婪和私欲。

最有意思的是，成思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并非科班出身。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的成思危长期在化工部工作，历任专题组长、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副部长。成思危的转型始于他 1981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深造，在那里他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从此开始介入软科学领域进而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的工科背景对他的经济学研究影响是抹不去的，工科的务实对于他的思维定势更是如此。

不久前成思危在 2004 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的精彩演讲很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务实风格。有关全流通的话题，成思危提到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不同角色分工。“实施全流通一定要有周密的策划。我常说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经济学家更多关注什么是理想的模式和为什么这是理想的模式，就是 What 和 Why 的问题，管理学家关注的是怎样从今天的现状过渡到明天的，是 How 的问题。现在行为金融学、行为经济学也是考虑怎样实现的，总的来说经济学和管理学还是有这么一个不同，如果说经济学家描绘了河对岸是一片美丽的风光，管理学家就是研究怎么过这个河，所以一定要周密策划。”

全流通的设计是资本市场论坛的主题，云集了各方的有识之士，既有真知灼见，也有信口开河，既有即兴之作，也有深思熟虑，既有拍胸脯的，也有拍脑袋的。成思危的妙语连珠，听起来无所指，但想起来又有所思。比如他以走象棋打比喻，“改革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路径依存，就像走象棋，你走的第一步影

响到以后的每一步，如果只考虑第一步先走了再说，如果要退回来代价就非常大，而且有的是不可能回头的，不像走象棋可以悔棋，改革不能这样。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三起三落，每一次起落都造成很大的损失，都有一部分财产流入个人的腰包，所以再搞全流通一定要周密策划，策划好，走一步要想好以后的几步，什么时候实现，怎么走。”

成思危对于全流通是怎么判断的呢？

一方面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应该认真研究解决股权割裂问题的时候了，另一方面，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又认为绝对不是短期的事情。任何方案都要考虑各方的利益，达到“帕累托效应”。一套行之有效的股市全流通方案应该具有六个方面的可行性：技术上是可能的，经济上是合理的，法律上是允许的，操作上是可行的，进度上是可实现的，政治上要能为各方所接受。

显然，仅仅靠经济学家是难以完成这样的系统工程的，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成思危专门谈到了学者和领导的关系处理。

“要尊重领导但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但不迁就现实。领导确有他的考虑，这和学者不一样，不要因为我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就怨天尤人，垂头丧气。因为学者是研究什么最合理最好的，领导考虑很多因素，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是不一样的。我曾经说过，完全不听参谋意见的领导是独裁的领导，完全听参谋意见的领导是无能的领导。所以作为领导来讲，成见不可有，主见不可无。对领导要尊重，但千万不要迎合，迎合的结果是误导领导。”

成思危提及的领导也许是尚福林，也许不是尚福林。如果是前者，大家就可以据此对目前的全流通讨论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不是，也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总之，成思危是不会无缘无故议论“领导”的。

（三）李青原何以出风头

年头年尾是北京会议最多的时候，和以前大家深恶痛绝的“文山会海”不同，现在各种各样的峰会、年会和论坛属于会展经济的组成部分，官方举办的并不多，也就是说直接来自财政的支出并不多，开这样的会是没有心理压力的，不用担心受组织上的追究。

会议一旦商业化，那么就难免和金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会议也就不再是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讲坛。会议无形之中也就变成一个名利场，一个各种利益代言人的讲堂。有的人发言是要收费的，有的人发言却是要付费的，有的人既不付费也不收费，纯粹是尽义务。经济学家在一般情况下是属于收费的发言者，因此，他们是会展经济名副其实的受益者。在这样的场合，他们的发言一般只能代表自己，而且未必能代表那个本我的自己，这样的场合发言多了也难免缺乏新意，给人不过尔尔的感觉，这是会议的错，不是经济学家们的错。

第八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中国证券报、银河证券和野村证券共同主办，虽然主办单位中券商占的成分很大，让人对会议的权威性产生顾虑，但是论坛的主旨还

是相当严肃的，“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裂与流动性变革”非常贴切地引出主题“全流通之路大讨论”，所以不但论坛引人关注，出席论坛的人更引人关注，官员、学者、专家概莫若此。

李青原博士就是论坛上最出风头的学者。

李青原早年留学海外，回国后参与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可以说也算中国股市的元老级人物，李青原现供职中国证监会规划委，任办公室主任，应该算是证监会的官员，而且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是除了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先生外分量最重的证监会人士，李青原的观点无疑会对她主持的规划委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学家的分类中，李青原显然属于政府经济学家。

李青原之所以最出风头，是因为她鲜明的提出了解决全流通的时间概念。她明确表示，2004年是解决全流通的一个很好的时机，理由是目前不仅市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共识，而且宏观经济好转，股市也在稳中向上。在具体操作上，李青原倾向于试点先行，选择没有严重历史问题、基础好、在国民经济中有代表性、和国民经济状况关联度较高、实施全流通后股价能稳中有升的企业。“这样能维持市场价格不过度波动。在试点过程中，逐步完善配套措施。”

在水皮的印象中，李青原是第一个提出要积极稳妥解决全流通的证监会官员。2003年10月30日，李青原在“中国改革论坛”上发言表示，股权割裂的制度设计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做任何事情都走不动。因为投资者觉得不解决这个问题，对资本市场就不会抱有信心。如何解决？基本的思路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什么是首创精神？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在市场上发现智慧，通过试点，不断完善，这是20多年来中国各方面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

李青原提出全流通试点方案时，上证指数在1340点附近。

此后的交易日中指数创出本轮大熊市的最低点 1309 点。李青原明确 2004 年解决全流通好时机的时间是在 2004 年 1 月 10 日，上证指数是在 1581 点，李青原所指股市稳中向上指的大概就是这 200 多点的涨幅。显然，在李青原的心目中，股指稳中有升是解决全流通的好时机，反过来，如果股指稳中有降呢？或者说 2004 年的股市先扬后抑或震荡牛皮呢？是不是就未必还是解决全流通的好时机呢？

全流通当然是完美股市的一个典型模型，这点共识是不用讨论就能达成的，达不成共识的首先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时间表。

2001 年 6 月国务院为了筹集社保资金缺口决定通过证券市场减持新发股票 10% 的国有股，由于在减持时贯彻同股同价的市价原则，引起市场强烈反应，2001 年 11 月国务院宣布暂停减持，2002 年 6 月 24 日宣布停止减持。全流通问题是在 2001 年 11 月之后由证监会主持全国征集国有股合理减持方案的过程中被提出来的，因为减持极易引起全流通的猜想，减持的价格更对未来股价预期产生巨大的压力，因此市场始终处在动荡之中。2003 年 7 月所谓“三三制”的方案再次触动市场神经，引起市场暴跌，国资委被迫三次澄清并召集了新闻发布会。2003 年 10 月市场开始流传李青原所提及的试点方案。全流通方案被有关专业媒体描绘成所谓利好。但是想不到的是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一而再、再而三表示，目前找不到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国资委并不急于减持国有股，即使要减持也要坚持对所有投资者“一视同仁”的原则。国有股不减持，讨论全流通就是无事忙，毫无意义。从这点上讲，全流通时间表不是由证监会制定的，而是由国资委制定的。

其实早在 2001 年 6 月的时候就有人提出那是解决全流通的最好的时机。当时正值大牛市，资金充沛，投资者信心十足，如果国有股减持的价格合理，考虑到了流通股股民的升值空间，

那么市场自身的热度或许就能抵消由于减持而带来的寒意，维系住一个平衡的局面。说一千道一万，减持，不管是按市值减，还是按净资产减，都是国有股变现的过程，都需要流通股股东拿真金白银来埋单，都是变相扩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增量资金进场，市场除了选择向下没有其他出路。水皮强烈反对在大熊市中讨论全流通，道理就在这里。这个世界上本没有鬼，人都是被人给吓死的，在大熊市中，全流通就是一个鬼故事。

当然，所谓好时机都是相对的，在方案还没有之前，所谓的好时机和最好时机都是网络空间的概念，只宜适用虚拟语态。

那么 2004 年是不是一个好时机呢？

同样出席会议的天相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林义相认为，2004 年不是解决全流通问题的好时机，因为相对市场化和行政化手段结合的方式并没有变化，而上海金信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康也认为 2004 年可能是不太好的时候，因为它是股市不高不低的时候。林义相和李康可算是老板经济学家，他们站在市场的一线，对于市场的感受恐怕要比李青原强烈，他们认为 2004 不是个好时机和李青原认为 2004 年是个好时机的原因是一样的，差异在于李青原认为 2004 年稳中有升，而林义相和李康认为未必能够出现相对高点。

不管 2004 年是不是一个好时机，至少我们回避了另外一种可怕的观点，那就是在股市低点用休克疗法一举解决全流通，反正指数已经在低点了，再跌也跌不到哪去，这才是不负责任的观点。

李青原博士是个学者，李青原的观点代表的是她个人的学术观点，是与非大家都可以以平常心待之，因为以李青原的职务，全流通这样重大的政策还不会由她来发布，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称李青原为李博士，而不是李主任。

（四）季晓南何以有异见

证券市场周刊的林鹰在主持周末茶坊，每周都要和水皮商量写些什么东西，对于全流通的选题，她的感觉很糟糕，就像吃什么东西太多了被撑了一样，这种呕吐感想必许多人都有。

林鹰对全流通不感兴趣可以不约稿，但是水皮不感兴趣却还不得不写杂谈，为什么？因为现在有的经济学家只要提及全流通，就会首先有一个界定，那就是所谓的前所未有的“共识”。对此，水皮有些想法，包括眼下写的东西就是想和这种“共识”开个玩笑，表达表达“不同政见”，告诉那些可爱的学者们，“共识”并不是像翻书作报告那么容易就能达成的，如果真有什么“共识”的话，那么还用得着开这个会那个会，还用得着劳驾各位费心费神给我们作演讲吗？

当然，没有大的“共识”不等于没有小的“共识”或者在某些方面，或者在某些群体。毛主席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经济学家也是人，是人就有一个“人以群分”的问题。事实上，由于不同的学术见解而形成的不同学派就是某种“共识”的结果，资本市场论坛能推出“全流通之路”作为主题，也是某种“共识”的结果，只不过这种“共识”更多的集中了赞同全流通

方案讨论的学者，而反对者的力量太不成比例而已。

在不成比例的反对者中有两位的观点值得细读。一位是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室主任季晓南，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王明夫，前者是位政府经济学家，后者算是位学院的理论经济学家。

季晓南对全流通发表了四点看法。看法之一要有利于股市的健康、稳定的发展。看法之二应该做到一视同仁、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国资委作为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管理国有资产的特设机构，是国有产权的代表，同股同利、同股同权是负责任的态度，如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对国资委讲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全国人民也是不负责任的。看法之三，解决全流通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形成机制。国资委前期提及参考净资产，参照现在的表现定价，市场有不同意见，其实，股票作为特殊商品也应该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由供需双方、买卖双方决定价格。在目前没有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机制之前，如果仓促进行全流通，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可避免。看法之四，全流通方案应该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同股同价是 2001 年 6 月的国有股减持所确定的价格原则，亦是一个广受市场攻击的原则，赞成这个原则的经济学家的人数不多，声音相对微弱。国务院发展中心企业所副所长陈淮先生是持这一观点的，水皮为此还和他有过商榷。季晓南现在依然坚持这一观点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在这么一个论坛上，面对这么多的对立面更是难能可贵。国有股减持该不该同股同权可以有不同想法，但是，季晓南提到的价格机制尚未形成却是现实。如果说大多数认为找到了全流通“共识”的经济学家代表的是买方的利益的话，那么少数如季晓南这样的政府经济学家代表的就是卖方的利益，买卖双方的利益代言人毫无疑问在定价原则上存在重大分歧，更不用说如何在原则的指导下形成机制了。

王明夫则从并购业务的角度阐述了他的“政见”。所谓的全流通问题最大的障碍不是法律和利益的冲突，而是流通股价格比非流通股价格高。如果非流通股比流通股价格高，就不会有现在的讨论了。王明夫举出青啤和重庆啤酒的例子，青啤的 H 股价格长期高于 A 股，而重庆啤酒的净资产只有 2 元多，但是法人股卖了 10.5 元。王明夫没有举乐凯的例子，实际上乐凯的事例更具代表性，乐凯 20% 的股权转让给柯达，每股折合人民币价格为 12 元多，高于当时的流通股价格，在这样的买方市场面前，可能要求乐凯的法人股以净资产的价格配售给流通股股民吗？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对此却视而不见呢？还是故意回避？回避这样的现实，提出的方案如何才能让卖方心服口服呢？这是做学问应有的严肃态度吗？

王明夫认为这种趋势之所以在从前没有到来，是因为我国以前买方形成的资本量级不够，但现在随着民营资本的财富积累再加上国际资本进入我国，使得国内资本需求方式非常强劲，而且量能被积极放大。在这种资本洪流下，不存在国有股以低于市价流通的问题。此外，全流通问题并不跟股民息息相关，不要把它跟二级市场的涨跌直接联系起来。

王明夫的解释前一半是成立的，后一半则不成立，但是后一半的认识并不掩盖前一半的光芒。水皮不清楚王明夫的背景，但是从他前一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有远见的经济学家，一位跳出现实看现实的学者。王明夫是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向前看，什么叫做在发展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很多现在看起来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重大疑难问题，若干年后大家就会发现不就是小菜一碟嘛，当时怎么会那么偏执呢？一定要创造条件霸王硬上弓呢？

在发展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李荣融说国有企业业绩上去了，减持就不

是什么问题，投资者买股票买的是企业的未来，分享的是企业的增量空间，而现在所谓全流通的方案却全都纠缠于所谓的补偿原则，打的全都是存量资产的再分配的主意。要求国有股股东让利于民，这在道义上是可行的但是在法理上却是无据的，政治上是危险的，操作上是不可能的。如果宝钢作为全流通的试点，QFII开出的价格就不会低于流通股的股价，甚至有可能高于流通股的股价，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是因此获益，还是因此受损？又该给谁“补偿”？水皮一直不赞成现在讨论全流通，一则是因为现在受制于意识形态，一则是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公司的未来，相信中国上市公司具有长期的升值空间，届时也会有“大智慧”出现，现在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有人算过账，认为中国流通股股民为中国股市贡献的资金达9000亿，因此必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谁来付？就是侵吞了流通股股民利益的非流通股股东来付，说穿了就是由国有股股东来付，政府来付。这账算的对不对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算的历史的老账，秋后算的账，现在的国资委不认这种算法。

当太多的经济学家作为流通股股东代言人出现的时候，他们的身份与其说还是经济学家，不如说是股民代表，由股民代表做出的方案当然代表的是股民的利益。水皮也是股民，他们当然也是代表了水皮的利益，水皮应该感谢他们，但是水皮知道这样做出来的方案是很难做到公正的，因此也是很难得到卖方认可的。卖方不认可，卖方就不卖，卖方不愿卖，再好的方案，再多的补偿也是水中月，镜中花。

（五）国资委何以做决策

王怀忠是安徽省的副省长，春节前山东省高院宣布维持一审对其的死亡判决，王怀忠保命的期望基本破灭。

导致王怀忠走上不归路的罪名是一般贪官的“常见病”，即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无论是官位，还是巨额财产的数目，王怀忠都不是落网贪官的代表，王怀忠之所以引起媒体如此强烈的关注，是因为这个贪官在一片控告声中被火箭式提拔起来的神奇经历以及他信奉买官卖官的信条，这既成就了王怀忠，也害了王怀忠。如果王怀忠不是副省级，那么中纪委就管不着，中纪委会管不着，王怀忠就可以为所欲为，就不会被揪出来，因为在提拔到副省长的宝座之前，王怀忠就已经是安徽省内有名的“王坏种”，副省级害得王怀忠丢了性命，这是王怀忠死都不会明白的“为什么”。

新一届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应运而生。理论上讲，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也应该相应配套，但是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设置国资局了，因为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甚至事业单位的资产都已经抢在国有资产转让条例出台之前被卖光了，而且还美其名曰“转变思想”或者冠之以“国退民进”。若